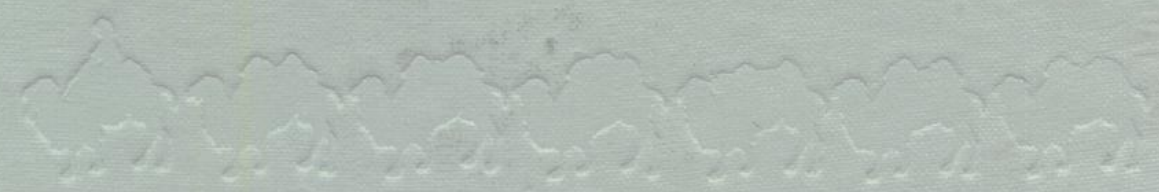


清代西迁新疆
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
译 编



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 满文档案译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封面设计:阿拉腾奥其尔

责任编辑:阿拉腾奥其尔 寇俊敏

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

(北京文津街7号 邮政编码 100802)

北京市大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092×787 1/16 印张:21 $\frac{6}{16}$ 字数:400千字

1994年4月第1版 1994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900 定价:44.00元

总策划： 马大正 徐艺圃 武立德

编委会： (按姓氏笔划为序)

牛平汉 毛缠邈 那 克 李遐龄
阿尔亚 阿拉腾奥其尔 张 玉
吴元丰 赛 来

主 编： 吴元丰 牛平汉 阿尔亚

ZJ45/06

അതിനാൽ ഞാൻ നീയെ പറ്റി പഠിക്കുന്നു

അങ്ങനെ ഞാൻ നിങ്ങളെ പറ്റി പഠിക്കുന്നു

献 给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成立四十周年

序

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州长 武立德
中共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委员会 副书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已步入了不惑之年。正值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成立四十周年之际，首部反映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历史档案集——《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正式出版，值得庆贺。我作为察哈尔蒙古的一员，又是此项工作的总策划人之一，感触尤多，记述于斯，是为序。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是伟大祖国西北边陲的一块美丽绿洲，山青水秀，草原似锦，畜肥粮丰。蒙语称这块青色的草原为“博尔塔拉”。古代诗人誉之为“西来之异境，世外之灵壤”。博尔塔拉有悠久的历史，可上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在唐代，这里已是“丝绸之路”北路的必经要道。据史载，在元代之前，博尔塔拉草原就有游牧的蒙古族部落。1225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把博尔塔拉在内地伊犁河流域封为次子察合台的领地，使博尔塔拉首次出现在《元史》记载之中。之后，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游牧生息于此，18世纪60年代以后察哈尔蒙古迁入，土尔扈特蒙古回归，与其他民族一起，开发和保卫这块富饶的土地。

1954年7月13日，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成立，揭开了博尔塔拉历史新的一页。博尔塔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主攻畜牧业，大力发展工业，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方针，博尔塔拉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很快发展，1990年，第二座亚欧大陆桥在本州境内阿拉山口飞架贯通，给这块生机盎然的绿洲，展示了广阔的前景。博尔塔拉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同步发展，随着各民族人民文化的提高、教育的普及，对于历史的了解也日益迫切。为人们提供准确的本地地区的历史知识，是我们的紧迫任务之一。

蒙古族是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主体民族。博尔塔拉的蒙古族主要是清代察哈尔蒙古八旗和旧土尔扈特部人的后裔。本书的出版，将向人们提供有关18世纪60年代察哈尔蒙古八旗西迁新疆的历史足迹和他们保卫边疆、开发边疆的不朽业绩。既利今朝，又惠后代，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科学实践。

这次科学实践，是一次有益的寻索、成功的合作。典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大量清代满、汉、蒙文档案，是有清一代历史的极宝贵文献，本书收录并汉译的数百件满文档案尽管是其中的极小一部分，但它所包含的丰富内容，既为历史学家深入研究准备了资料基础，也为当代生活在新疆的察哈尔蒙古人民了解自己祖辈的光荣历史提供了可能。同时本书的出版也是专业史学工作者与地方史志工作者通力合作、取得成果的尝试，为今后更广泛的联手研究积累了经验。

现值本书付梓之际，衷心祝愿我的故乡博尔塔拉繁荣昌盛！

清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 史料与历史——代前言

马大正

察哈尔,《明史》称“插汉儿”,又作“插酋”、“插汉”,蒙古旧部落名。明嘉靖中,达延汗曾孙达赉逊库登汗,因不堪俺答汗侵扰,徙牧辽东边外,图们汗嗣位后,势力强盛,一度控制建州女真。林丹汗时察哈尔成为蒙古强部,屡与后金争战,后金天聪八年(1634),林丹汗兵败西退青海,其子孔果尔额哲率部降后金,被封为亲王。康熙十四年(1675),额哲之侄布尔尼乘三藩之乱举兵反清,布尔尼兵败身亡,余众被迁至宣化、大同边外,编为察哈尔八旗,驻牧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东南部及锡林部勒盟南部,为内属蒙古。

18世纪50年代末,清政府实现了对新疆的统一。为确保对西北地区的管辖与军事防御,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政府决定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作为中央政府派驻新疆的最高军政长官,在其下设都统、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分驻全疆各地,管理当地军政事务。清政府为了保卫新疆和开发新疆有计划进行成边移民,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遣满洲、索伦、察哈尔、厄鲁特、锡伯兵丁携眷移驻伊犁,分别组成“满营”、“索伦营”、“锡伯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供伊犁将军控驭调遣。满洲兵驻惠远、惠宁两城,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分列四境”为伊犁屏蔽。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西迁新疆成边活动,构成一幅西进的宏伟图幅,这批西进者在保卫新疆、开发新疆实践中建立的伟业,引起了历史学家和今天西进者们的极大兴趣。

在这股西进洪流中,察哈尔蒙古的成边队伍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后裔今天成为居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蒙古族的主要组成部分。自己祖辈光荣的创业史自然成了今天生活在新疆的察哈尔蒙古人关注的热点。

历史的思考与现实的要求,均向我们提出了同一问题:应着力研究清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历史。

一、研究中被遗忘的一角

进行一个专题研究,第一步是了解对此问题的前人研究成果。清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历史属清史、蒙古史、西域史研究范围,但我们对上述领域的成果做一番考察后,不能不遗憾地得出结论: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的历史是清史、蒙古史与西域史研究中被遗忘的一角。

在一些有影响的清史著作中,如戴逸主编《简明清史》1、2册^①,王戎笙主编的十

^① 人民出版社,1980,1984年。

卷本《清代全史》^①，杨学琛《清代民族关系史》^②等，对这一段历史基本没有涉及。

那么在当代的西域史专著中情况又如何？《新疆简史》第1册^③，方英措《新疆屯垦史》^④，赵予征《新疆屯垦》^⑤，同样对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一笔带过。李德华等编著《新疆与内地关系史》^⑥也只有不到300百字的记述。在几本地方史志著作中，如《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概况》^⑦，《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概况》^⑧，《博乐市志》^⑨，《博乐市地名图志》^⑩，《温泉县地名图志》^⑪，虽有或详或略的概述，但均失之过简。

几部有份量的蒙古史专著，如翁独健主编《蒙古族简史》^⑫，内蒙古社科院部分学者编撰《蒙古族通史》^⑬，卢明辉《清代蒙古史》^⑭等，有的没有提及，有的则一笔带过。金巴扎布等主编《察哈尔蒙古族史话》^⑮这本以察哈尔蒙古为论述对象的著作中，对西迁新疆的察哈尔蒙古的历史与现状也只字未提，实在令人遗憾。

从我们读到有关研究论文中，尚不乏有一定研究深度之作。蔡家艺《新疆察哈尔营、厄鲁特营概述》^⑯利用了作者所能收集到的汉文档案和史籍，对察哈尔蒙古西迁历程，察哈尔营的设置和职能等问题作了较深入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本研究专题的一篇力作。胡博生《博尔塔拉察哈尔部史略》^⑰论述颇为详述。值得重视的是出生于博乐市的察哈尔蒙古年青学者巴赫的研究工作，1987年以来先后发表了3篇论文：《察哈尔蒙古西迁》^⑱，《察哈尔蒙古究竟何时西迁》^⑲，《清代新疆察哈尔营的戍守与开发》^⑳。作者结合实地考察成果分别论述了察哈尔蒙古西迁的时间、人数，察哈尔营的设置、职守等问题。此外还有哈斯巴·博河《清代新疆察哈尔营牧地考》^㉑，阿·青甫《察哈尔营蒙古族西迁和新卫拉特形成》^㉒也可资参阅。

从现有研究者所利用的史料看，除《清实录》外，主要是《西域图志》，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和《新疆识略》，祁韵士《西陲要略》，徐松《西域水道记》等。对一些较罕见的汉文史籍，诸如格琿额《伊江汇览》，佚名《伊江集载》，永保《总统伊犁事宜》，佚名《伊犁略志》^㉓等，也少有研究者问津，这些古籍对察哈尔营的记述还是可补其他史册之不足的。

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②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③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④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89年。

⑤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⑥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⑦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⑧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⑩ 1990年铅印本。

⑪ 1989年铅印本。

⑫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⑬ 民族出版社，1991年。

⑭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⑮ 1989年铅印本。

⑯ 《蒙古史研究》第二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⑰ 《博尔塔拉文史资料》第一辑，1989年铅印本。

⑱ 《西北史地》1987年2期。

⑲ 与哈斯巴合作，《新疆历史研究》1987年7期。

⑳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

㉑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2期。

㉒ 《博尔塔拉文史资料》第三辑，1993年铅印本。

㉓ 均刊于马大正编《清代新疆罕见史料汇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

正是由于史料的不足,加之研究者的无暇顾及,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历史至今留下许多待解之谜,即以西迁时间来说就众说纷云,其他诸如西迁人数、西迁历程、察哈尔营的设置、职掌,以及生产、生活状况等等,均有待研究者上下求索、深入探微。

二、待开发的处女地——满文档案寻索初得

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研究所以能深入,其主要原因是史料缺乏和分散,尤其是前者,使研究者望而却步。要想使研究工作有新的进展,唯有向现典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浩瀚档案中,特别是满文档案中去寻索。

清代满文档案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在我以往从事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中已深有感触,正是利用了满文档案的记载,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才取得突破性进展,一些久议不决的历史疑点得以澄清。^①

这项工作的提出始于1989年夏天,当时我正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考察,这一设想提出后得到了自治州行政领导的赞同,更在当地蒙古族学者和群众中得到了热情反响。经此后一年余时间的商议、策划,顺利解决了开展此项工作必要的经费来源等问题后,1992年这项工作进入了寻索、汉译和编选阶段。参加工作的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吴元丰、张玉、宗印茹、毛必扬、关精明、张莉、赵玉梅;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马大正、牛平汉、阿拉腾奥其尔;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那克、李遐龄、王维梁、胡博生。我们共检索了满文录付奏折,月折档、寄信档和议复档等1056件,始于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迄止宣统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并从乾隆朝610件中选译了462件(正件333件,附件129件,始于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迄止六十年十月二十六日),编成《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②一书,为便于研究者利用,将未汉译的594件档案目录汉译后附目于书后,以备检索。

现将1056件满文档案文献,依朝代所属列表如次:

	已汉译档案		存目档案	合计
	正件	附件		
乾隆朝	333	129	148	610
嘉庆朝			159	159
道光朝			175	175
咸丰朝			70	70
同治朝			15	15
光绪朝			25	25
宣统朝			2	2
				1056

① 参阅,马大正,蔡家艺:《卫拉特蒙古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② 此书将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于1994年出版。

需要说明的,清政府自光绪朝以后,大量奏稿都用汉文书写,所以满文档案相对减少。

从已汉译的 462 件满文档案看,所反映的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历史大体上包含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清政府将察哈尔蒙古部份兵丁西迁新疆的决策过程;

第二,清政府为保证察哈尔蒙古西迁顺利进行所采取的政策措施;

第三,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历程与安置情况;

第四,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后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生产、生活状况;

第五,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后与周邻诸族的关系;

第六,察哈尔蒙古为开发新疆、保卫新疆作出的贡献;

第七,历任察哈尔营官员履历。已汉译的满文档案中共包括了乾隆年间 50 余名察哈尔营官员的履历。

综合上述满文档案的丰富内容,结合有关汉文史籍的记载,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历史基本上可恢复其本来面貌,从而既为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准备了可靠资料基础,也为当代生活在新疆的察哈尔蒙古各阶层人民了解自己祖辈的光荣业绩提供了可能。

三、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几个历史断面

历史断面之一:西迁之举的决策。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军对准噶尔汗国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由于长期残酷的拉锯式军事行动,准噶尔部众或直接丧生刀下,或间接死于战乱,或四散逃亡,造成伊犁地方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清政府在统一新疆后,为恢复生计,充实边防,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二月十七日,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安泰等为增加牧放力量即提出:“从内地抽调蒙古兵”的建议^①,但很快(次年正月初五日)被清政府最高当局否定,认为“在伊犁既有蒙古兵,相应不必往乌鲁木齐另行调派蒙古兵,所有牲畜均解往伊犁,移交阿桂,编设牧群,牧放取草。”^②可时隔半年有余之后,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九月三十日,大学士傅恒提出拣选察哈尔官兵携眷移驻伊犁的长篇奏折。为增加兵力,充实边防,减轻政府后勤保障压力,走屯垦戍边之路,建议:“从察哈尔兼管新旧厄鲁特及察哈尔八旗之单身贫困余丁内,拣选年富力强、情愿携眷迁移者一千名,分别迁往伊犁、乌鲁木齐永久驻防。”^③奏折中还提出了为妥善实施这一西迁建议而应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诸如对西迁兵丁待遇上的优惠,路线的选择、官员的配置等等。这一计划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准:“现拟选派之一千名察哈尔、厄鲁特兵,著富德、巴图济尔噶勒驰驿前往察哈尔游牧地方拣选”。^④乾隆二十六年十月,富德等一行即赴多伦诺尔,从察哈尔八旗右、左两翼中“选得年力精壮,堪以为兵者,及其父子兄弟一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下同,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1858-39,(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一书所收档案编号,下同,略, No.1)。

^② 军机处满文寄信档,129-1.(No.1附件)。

^③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860-1.(No.2)。

^④ 同上。

千名”^①，此乃为第一批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之众。乾隆二十八年(1763)正月初六日，大学士傅恒为“省新疆换防之烦”又提出续派一千名察哈尔兵丁携眷移驻伊犁，此议又得乾隆的批准^②。此乃为第二批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之众。

从上述决策过程看，清政府二次决定从察哈尔蒙古中抽调 2000 名兵丁西迁新疆是为了充实边防，永久驻守。屯垦戍边、开发新疆，这一任务决定了这些西迁察哈尔兵丁是携眷”、“永久驻防”。因此 17 世纪 50 年代随军西征到新疆的察哈尔蒙古官兵不属于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范围之内。从现实生活看，当今生活在新疆，主要分布在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察哈尔蒙古族，是 18 世纪 60 年代西迁新疆时察哈尔蒙古的后裔。

历史断面之二：西迁时间与人数。

察哈尔蒙古是分两批踏上西迁新疆之征途。

第一批，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三月二十日起程，在“地处察哈尔八旗中心位置之达兰图鲁地方集合”^③，“将每二旗编为一队，共分四队，头队由总管齐勒克特依率领于三月二十六日起程，每日起程一队，第四队由总管那旺率领于二十九日起程。”^④因均携眷，故“如同游牧，养畜徐行”^⑤。经推河于“六月二十一日抵达乌里雅苏台附近萨勒齐图地方”。^⑥经短暂休整，于七月十二日起程，“停止从乌里雅苏台直赴阿济比济、巴里坤，而逐水草之地，从扎布噶河以南都尔根泊、呼布呼泊、齐齐克泊地方行走，通过萨拉克布拉克，白布尔干、察干托辉至阿济比济之间，寻觅水草柴薪丰足之地，于所设卡伦内游牧过冬”。^⑦乾隆二十八年(1763)二月初三由察哈尔总管齐勒克特依、那旺率领一千名携眷察哈尔兵丁安全抵达乌鲁木齐^⑧。

一千名携眷察哈尔兵丁中，有 200 户察哈尔兵，大小家口五百四十二名按原计划留驻乌鲁木齐，由佐领旺舒克管辖，后其中 50 户户移驻库尔喀拉乌苏。其余“前往伊犁之官卡及其护送官员、委笔贴式等，共计八百四十三人”自二月十六日始，陆续编队起赴伊犁，^⑨于同年四月十五日抵达赛里木湖。“令伊等驻牧于水草丰盛之地，故停赴伊犁，由彼处翻越索霍罗固勒扎岭，逐水草驻牧于登努勒泰等地”。^⑩据伊犁将军明端安排，将其中 105 户携眷察哈尔兵丁驻守在伊犁至沙图阿满一线新设的七处驿站，并于同年六月二十日到位，新设驿站名称及里程数如下：

“自绥定城至河边驿站，六十里。

河边驿站至海努克驿站，五十里。

海努克驿站至索果尔之乌兰克尔齐驿站，九十里。

①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126-2。(No.4)。

②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687-1。(No.30)。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1932-21。(No:21)。

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1936-25。(No:23)。

⑤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1932-21。(No:21)。

⑥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1955-10。(No:27)。

⑦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1955-10。(No:27)。

⑧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13-14。(No:35)。

⑨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13-19。(No:37)。

⑩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27-15。(No:43)。

索果尔之乌兰克尔齐驿站至博尔驿站，七十里。

博尔驿站至霍诺海驿站，九十里。

霍诺海驿站至特克斯河之济兰噶图勒干驿站，百里。

特克斯河之济兰噶图勒干驿站至沙图阿满驿站，八十里。”^①

至此，第一批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 1000 人户，除 200 户，542 人留驻乌鲁木齐外，其余 843 人在赛里木湖周围游牧，不久又将其中 105 户调往伊犁至沙图阿满的七处新设驿站驻守。第二批，西迁察哈尔蒙古兵丁按计划分前队、后队二批出发，前队 500 人不带着属，后队 500 人连同家眷与前队 500 人眷属同行。^②

在第二批的 1000 人中，包括察哈尔蒙古八旗闲散壮丁 683 名，新厄鲁特兵丁 34 名，其他自愿前往之兵丁 283 名。^③

前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四月初九起程。^④由总官达克塔纳率领，于同年七月二十五日抵达推河，取道扎布噶于八月二十六日到达扎布噶河流域布鲁哈扎地方^⑤，在庫布庫爾赫勒越冬，乾隆二十九年三月初二起程，^⑥西进伊犁。

后队 500 兵丁和 1000 户家眷的队伍。于四月二十五日起程^⑦，由察哈尔总管成果率领，于七月二十九日抵达推河之乌兰额尔济，八月十八日抵达扎布噶之察罕托辉，稍作休整后，八日二十九日起程^⑧，于九月二十七日抵达巴里坤，在巴里坤越冬，乾隆二十九年(1764)正月十九日起程，二月二十三日抵乌鲁木齐，三日初一续西行。^⑨时大小家口共 2013 人，三月十一日抵玛纳斯，三月三十日抵晶河^⑩四月抵达伊犁。^⑪

我们依已汉译的满文档案所载，对二批西迁的日程和人数尽可能详地作了综述，但第二批中的前队何时到达伊犁，前队与后队是否会合，在何处会合，二批兵丁 2000 人，但连同眷属总人数到底多少，仍未查到明确记载，或可作出准确统计，只能存阙待补。对于松筠《新疆识略》卷 5“乾隆二十九年自张家口外调一千八百三十七员名移往”记述中这 1837 人也无法核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乾隆二十九年不是第二批西迁的出发时间，而是抵达时间，西迁之察哈尔蒙古兵丁连同家眷肯定超过 1837 人。

历史断面之三：安置地之变迁

乾隆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察哈尔蒙古 2000 人户分批西迁新疆，第一批 1000 人户中，有 200 人户留驻乌鲁木齐，余下 800 人户连同第二批 1000 人户均在伊犁地区赛里木湖一带安置。

①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139—2. (No. 51. 附件).
②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 687—1. (No. 30).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06—4. (No. 34).
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21—38. (No. 41).
⑤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51—47. (No. 55).
⑥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78—29. (No. 64).
⑦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23—31. (No. 45).
⑧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52—01. (No. 56).
⑨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78—31. (No. 63).
⑩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83—67. (No. 67).
⑪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114—10. (No. 83).

察哈尔蒙古兵丁到达后,初设“两昂吉”,“十二佐领”,分左右两翼,每翼六佐领。^①乾隆二十八年,在伊犁将军府设察哈尔领队大臣,任命乌岱为首任领队大臣。

乾隆二十八年冬,清政府从加强边防巡卡需要出发,对察哈尔蒙古驻牧地作了调整。

一是将留驻乌鲁木齐的150人户和库尔喀喇乌苏50人户察哈尔蒙古移往塔尔巴哈台。^②并于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分编前后两队,起赴塔尔巴哈台。^③

二是,将驻牧赛里木一带的察哈尔蒙古移驻博尔塔拉,博尔塔拉地处伊犁、塔尔巴哈台之间,便于两地照应,“该处有冬夏两季好牧场,且土地肥沃,可游牧兵丁孳生牧畜,殊有裨益”。^④由于户口增多,乾隆三十二年(1767)伊犁将军明端请于每昂吉下增加二佐领,仿满兵八旗建制,仍设左右两翼,每翼四旗,每旗两个佐领,共成八旗十六佐领。左翼四旗游牧于今温泉县境内,右翼四旗游牧于今博乐市境内。两翼各有官兵九百二十二人,各设总管一员,副总管一员,佐领八员,骁骑校八员,蓝领侍卫三员,笔帖式一员,领催三十二名,兵八百六十八名。^⑤原闲散在博尔塔拉的二百名厄鲁特蒙古也编入察哈尔左右两翼。

察哈尔蒙古官兵驻牧博尔塔拉后,担负着21个卡伦的驻防任务。其中常设卡伦9处:1. 乌兰布喇,2. 扎克鄂博,3. 哈布塔海,4. 乌柯克,5. 沁达兰,6. 索达巴罕,7. 冲库克,8. 库库托木,9. 达尔达木图。添设卡伦12处:1. 绰伦古尔,2. 音德尔图,3. 阿尔齐图哈玛尔,4. 喀喇乌珠尔,5. 木鲁,6. 沙喇布鲁克,7. 雅玛图,8. 硕博图,9. 察奇木图泥盖,10. 察罕乌苏,11. 鄂托克赛哩安达拉,12. 干珠罕。^⑥

为了加强新疆各地之间,以及与内地的联系,清政府在天山南北设有许多军台,军台负有传递奏折文报,应付过往差员,运送官物等职责。察哈尔营坐守的军台有五座:1. 塔勒奇阿满台(位于赛里木湖南岸之松树头),2. 塔勒齐尔台(位于松树头以北),3. 鄂尔哲图博木台(位于今三台),4. 呼苏图布鲁克台(位于今四台),5. 托和木图台(位于今王台)。^⑦

历史断面之四:民族间的和好、互助关系

察哈尔蒙古在博尔塔拉等地驻牧后,与相邻诸民族相处是和好的,察哈尔蒙古与卫拉特蒙古的关系尤为亲近,满文档案中为我们留下了他们亲如兄弟的感人记载。

卫拉特蒙古广大群众是清政府与准噶尔汗国长期对峙与战争最直接受害者。长期战乱,使“痘疫盛行,死亡相望”,^⑧“先痘死者十之四”。^⑨尽管这不是精确统计数

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191,兵十三。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100—28, (No. 81)。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120—33, (No. 89)。

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58—12, (No. 58)。

⑤ 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卷6。

⑥ 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0,《北疆略论考》。关于察哈尔营管辖卡伦,诸书记载大同小异。松筠《新疆识略》卷11常设卡伦中无达尔达木图,故常设卡伦8处,总辖卡伦20处。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卷9和祁韵士《西陲要略》记其所辖卡伦23处,其中无干珠罕布拉克安达拉,但却增添了塔勒奇阿满、鄂博勒奇尔、鄂勒斋图博木3处卡伦。

⑦ 松筠《西陲总统事略》卷3。

⑧ 昭璜《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

⑨ 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字,但战乱引发疫病,人民遭了殃。清军在第二次进军伊犁过程中,由于双方长期拉锯式的厮杀,清政府顾此失彼,三易将帅,使清政府从乾隆到战场指挥官急躁、仇恨情绪急剧上升,虽然传统的招降、怀柔、安抚政策仍在推行,但在战斗进程中清军不分主使和协从,滥杀无辜的惨剧时有发生,且随着游击式拉锯战的持续,屠杀无辜也愈演愈烈,使准噶尔人民蒙受极大劫难。但是还有大量准噶尔人或逃往哈萨克、布鲁特牧地,或流向天山南路维吾尔居地,隐匿身份,以避杀戮之祸。

随着新疆战事结束,和平环境出现,准噶尔人也陆续返回家园,此时在清政府安排下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是这些归来准噶尔人主要安置处。察哈尔蒙古人民克服自身安家不久的困难,承担起接纳这些劫后余生的准噶尔人的任务。

据已见到的乾隆三十年三月至三十二年七月 8 件档案所载,这一期间自哈萨克、布鲁特返回被安置在察哈尔营和厄鲁特营的准噶尔人有 768 人,实际返回人数肯定要超过这一数字,这对流离失所饱经战祸的准噶尔人不啻是雪中送炭的义举。

现将历年返回人数列表如次:

年 月	人 数	来自何处	资料来源
乾隆 30 年 3 月	104 人	哈萨克	满文录副奏折 2134—5, No. 92
乾隆 30 年 3 月	180 人	哈萨克	满文录副奏折 2139—23, No. 93
乾隆 30 年 6 月	62 人	哈萨克	满文录副奏折 2149—26, No. 96
乾隆 30 年 10 月	104 人	哈萨克、布鲁特	满文录副奏折 2163—6, No. 97
乾隆 30 年 12 月	33 人	哈萨克	满文录副奏折 2175—11, No. 99
乾隆 31 年 10 月	190 人	哈萨克、布鲁特	满文录副奏折 2206—23, No. 114
乾隆 32 年 1 月	81 人	哈萨克、布鲁特	满文录副奏折 2215—32, No. 116
乾隆 32 年 7 月	14 人	哈萨克、布鲁特	满文录副奏折 2235—11, No. 123
	合计 768 人		

乾隆三十六年(1771)夏,新疆又发生一起震动清廷的大事。移居伏尔加河流域 140 余年的土尔扈特蒙古近 7 万人历尽艰辛返回祖邦。是年五月二十六日(7 月 8 日)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土尔扈特蒙古东返前锋部队在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

去相迎的清军相遇。六月初六(7月17日),清军总管伊昌阿、硕通在伊犁河畔会见了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以及土尔扈特部的东返主力和家属。^①在清政府统筹安排下,察哈尔蒙古积极参与了接济土尔扈特部众的行动。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察哈尔营主动向土尔扈特捐赠:孳生牛1000只,孳生羊10000只,皮袄2000件,“以备散给土尔扈特之众”。^②乾隆三十七年秋天,察哈尔营又接纳了渥巴锡所属500户土尔扈特到博罗塔拉,^③并教习土尔扈特人等种田,因“土尔扈特人等内,缺衣少穿者众,官兵业给土尔扈特人等资助御寒衣服”。^④由于“察哈尔官兵教习土尔扈特等种地,收获颇丰,并办给贫困人等御寒衣物,所办甚好,”伊犁将军伊勒图提出,“应按照料土尔扈特种地之满洲官员之例嘉奖。”^⑤这种和好、互助的民族关系成为当地人民的优良传统,一直绵延至今。

四、结束本文时的思考

要发掘新的史料,资料是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为使研究得以深入,进一步发掘史料是当务之急。现存清代档案文献的重要价值正日益为中外学者认识,并用之于研究之中,取得了可喜的效果。档案文献中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的整理尤其具有特殊意义。我个人对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实践也证实了此点。本文写作再一次说明民族文字档案文献在研究中独特的地位。

要扩大视野,开拓思路。在清代,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为保卫边疆、开发边疆,有计划向边疆地区移民成为清政府的一项既定国策。有清一代,特别在清前期移民边疆呈现人数多、地域广和持续时间长的特点。新疆地广人稀是当时移民的一个重点地区。18世纪60年代以后,除察哈尔蒙古外,还有满族、锡伯、索伦、绿营大批兵丁西迁新疆,同时清政府还从甘肃省甘州、肃州和安西州等地招募百姓进疆屯田,^⑥一时间形成一股西进开发的滚滚洪流。我们应从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从宏观上认真研究清政府在推进这一开发边疆宏业中的历史作用和经验教训;从微观上则应对西迁的每一具体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只有把具体的个案研究清楚了,才能对清代前期的西进开发活动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才能更深刻认识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清代得以奠定的历史必然性。

^① 参阅马汝珩、马大正:《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第177—17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432—21, No. 172。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422—2, No. 186。

^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2553—21, No. 203。

^⑤ 参阅郭松义《清代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载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边疆开发研究》第35—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徐伯夫《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民屯》,《中国史研究》1985年2期;华立《乾隆年间移民出关与清前期天山北路农业的发展》,载版曙主编《新疆经济开发史》上册,第97—123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

凡 例

一、本书选择的档案史料共计490件,其中正件333件,附157件。这些档案史料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满文档案,每件之末,注明其全宗、文种和档号,并加()号。

二、本书选译的档案史料,均由编译者缮标题,并予标点和分段。鉴于清代官文书内层次较多,故未采用引号。

三、本书选译的档案史料,原则上按其具文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具文、收文或朱批时间皆有者,将具文时间置于文前,收文或朱批时间置于文后;无具文时间者,以收文或朱批时间编排,并置于文前,加标*号。凡考证推定的时间,均加标[]号。

四、本书选译的奏折,凡奉朱批“另有旨”、“著军机大臣议奏”,且其内堪以选用者,将所奉的谕旨和军机大臣的议复折均作为附件,附于折后,以便查阅。

五、本书选译的档案文件中,凡是皇帝的行批,均加“朱批”二字,并以()号括起来,置于适当之处。

六、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人名、地名,凡能在汉文史书和历史地图上查到者,一般照用;无法查到者,则依据清光绪十六年新刻《清汉对音字式》译写。其他一些专用名词,若有对应的汉名,则沿用;若无对应的汉名,或在工具书中查不到者,均取音译,并采用加边注的方式加以说明。

七、本书选译的档案史料,原则上均予全文公布,惟个别文件与主题无关,或前后文内容重复过多之处,略作删节,并加注说明。

八、本书选译的档案史料,凡有错讹之字,由编译者在()号内注正;遗漏之字,在[]号内补写;残缺之字,以□号代替。

九、本书编译者的注释,用①、②……等符号作文后注。

十、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中查到有关西迁察哈尔蒙古的史料共594件,但因字数所限,不可能全部编译出版。考虑到察哈尔蒙古的西迁及其营制的确立均在乾隆年间,因此从乾隆朝的档案中选译490件,编印成书。其余未选译的档案文件,逐件摘由,编成目录,附于书后。